

答劉述先教授

——再論「克己復禮」的詮釋

● 何炳棣

在作自純方法論答覆劉述先教授對我〈真詮〉一文攻擊之前，不得不先提出的是劉先生覺得討論問題最高明的辦法是先對對方作廣義的人身攻擊。他開頭即假定了我的動機是尋找真憑實據「給『杜維明教授』以致命一擊」，因此〈真詮〉「完全看不出一點長者的風範」。更以「先驗」式的假定說我「也沒有受過嚴格的邏輯推論的訓練。」這些將在本文最後兩節作一簡覆，最要緊的是先答覆他對〈真詮〉內容的批評。

一 史料及「內證」的問題

劉先生主要的意見：

……要解釋《論語》某一章的意義就要在《論語》本身找材料，在思想上找到一條通貫的線索，才能真是內證。《論語》裏的材料雖然不是每條都可靠，但若不依靠孤證，就可以建立相當程度的可靠性。但何先生找內證找

到《左傳》去了……

這段話中主要較長的一句句法構造很費解，但不要管它。「但若不依靠孤證」這限定語氣的真意不够清楚，究竟是《論語》中的孤證應該完全摒棄不用，還是有時可用？如仁、義、禮、智、信、忠、恕、恭、直等等在《論語》總共出現至少二百次，有時從問題或整句中發現對以上某字有很特殊的意義，這類孤證應該不應該用呢？劉先生既原則上認為孤證以不用為宜，何以沾沾自喜地提出「禮後乎？」這一極明顯的孤證作為攻擊〈真詮〉的最關鍵性的「實據」呢？這類自相矛盾半通不通的史料方法論不宜在此多談，但責我重用《左傳》一點必須要辯駁。

雖然為重構孔子全部思想體系，《論語》是最重要的史料，但是對《論語》一些個別問題深入的探討，《論語》本身是不足遠甚的。因為《論語》所記往往極其零散，對論及某人某事某種道德問題的當時情況背景，並無

清楚的敘述。《左傳》中凡言及孔子或仲尼的，往往是極珍貴的一手資料，因為內中不但有孔子所說的話，還說明孔子是在甚麼情況之下說的。這種對孔子當時的所言所行以及當時具體情況的記載是證實、補充、加深瞭解《論語》語錄的最佳史料。我之所以認為對詮釋「克己復禮」而言，《左傳》中有一「奇迹」，是因為：(1)《左傳》保留下仲尼當時的言論。(2)《左傳》對楚靈王末日的記言記事異常詳盡精采，而《論語》對孔子針對何人何事而說「克己復禮為仁」，完全一字不提。(3)最重要的是《左傳》中開頭即講明，當孔子知道楚靈王自縊之後，所說的「克己復禮為仁」是引自一種「古志」：而《論語》卻給後人此語是孔子自創自說的印象。這一點在史料方法論上的重要性將在下文討論。

此外，《左傳》記事始於東周 722B.C.，下距孔子誕生一百七十一年。書中保留下大量早於孔子的政治家、哲人、史官的業績和對當時或更古的政治、社會、道德、文教等方面的觀察、議論和追述。這些都是研究孔子思想淵源必不可少的史料。

就詮釋「克己復禮」而言，《左傳》較《論語》優越並非我一人的主觀成見，也是清代經學大師毛奇齡、阮元諸人的見解。史料的權衡評估，學術界自有公論。

二 答「禮後乎？」

為使讀者清楚，劉評〈真詮〉原文一段須徵引：

何先生在《左傳》昭公十二年找到孔子徵引「克己復禮，仁也」的古語的證

據，就以為是支持他的解釋的鐵證，這樣的推論是「跳躍」的，不必一定是有效的。我們現在進一步檢討孔子對於徵引古籍的態度。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八佾第三）

這又是《論語》裏討論禮的一項極為重要的文獻，說明禮對於孔子來說是後起的。

子夏提問「禮後乎？」三字對劉先生而言，簡直是如獲至寶，這就可以充分證明對孔子而言，禮是後起的，所以「復禮」就根本談不到了。事實上，「禮後乎？」是孤證，但我並不反對劉先生用孤證。劉先生如此借重「禮後乎？」來攻擊我的方法，事實上供給了我一個夢想不及的、理想的衡量劉教授知識廣深度和思維水平的實據。

首先我必須指出劉教授之所以為此狂喜是由於他根本對「禮」這個無所不包的詞看法太簡單、太籠統。如下期拙文〈原禮〉所論，禮是多維度、多層面的：有原始祭儀·倫理層面，有制度文物層面，還有理論·意識形態層面。如不知分析種種層面，對《論語》全書出現74次之多的禮字的種種意義必定無法處理，即使勉強處理也必會引起混亂，而劉教授正在此處自行暴露出他思維的混亂。

姑且按照劉先生意思把「克己復禮」的禮和「禮後乎？」的禮視為等同。前者既由孔子講明是出自古志，此語中的禮一定比孔子古：此語既言及

《左傳》中凡言及孔子或仲尼的，往往是極珍貴的一手資料，因為內中不但有孔子所說的話，還說明孔子是在甚麼情況之下說的。這種對孔子當時的所言所行以及當時具體情況的記載是證實、補充、加深瞭解《論語》語錄的最佳史料。

禮是多維度、多層面的：有原始祭儀·倫理層面，有制度文物層面，還有理論·意識形態層面。如不知分析種種層面，對《論語》全書出現74次之多的禮字的種種意義必定無法處理，即使勉強處理也必會引起混亂。

「復禮」，這須要恢復的禮一定比古志還古，比孔子更要古得多。這樣古的東西，怎麼子夏會認為是後起的，而且得到孔子的讚賞呢？用初中英文文法作比，怎麼過去式、過去完成式會比現在式、現在進行式更「後」呢？豈不是孔子（事實上是劉教授）自打自己的嘴巴嗎？

子夏和孔子當然不會如此頭腦不清。後世用心的注釋家和讀者必定會問「後」於甚麼？我的解釋是根據我對禮的多維度、多層面性的瞭解。禮最早形成的層面是宗教·倫理的，也可稱為祭儀·倫理的，這是人類學家所公認的，普遍於古今全世界的；第二層面主要是制度·文物的；第三層面是理論·意識形態的。可是任何層面都不是化學式百分之百純淨的，多少都有其他二層面成分部分的重疊。這三個層面大體上很符合禮之史的演化。其詳請參閱下期拙作〈原禮〉。

根據個人多年對國史及歐洲史的反思，一種近似規律的通例是：當某種廣義的制度，在初形成、開始較大規模發展的時期，並不需要很多的理論工作；可是當此制度業已發展到極有系統、業已喪失內在動力、開始受到種種威脅行將無法自保的階段，才迫切需要大力的理論化、系統化、意識形態化的工作。

孔子正生值春秋晚期「禮崩樂壞」的階段。他除對「郁郁乎文哉」的西周典章制度具有無限的景仰之外，一生最大的願望是協助恢復西周鼎盛時期的政治社會秩序，至少提出些改革方案以期維護延長現存制度的生存。明明知道此項願望很難達到，仍然是「知其不可而為之」，把一生全部的知識與智慧和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廣義

禮制的理論化、道德化、美學化、意識形態化的工作上。這一龐大理論體系的建立者是孔子，完成者是兩個半世紀後的荀子。

經過以上的討論，筆者認為如果以禮的第一、第二層面比為一片素帛的話，第三理論化的層次就可比作後來在素帛上的加工——一幅悅目的圖畫。如以常識論先後，禮制形成於先，禮論闡發和完成在後。

除了捧着子夏的一個「後」字以為無價之寶以外，劉教授對子夏孔子師生對話絲毫未能作出任何詮釋和分析。

三 「復禮」是否恢復 西周之禮

劉文第四節特標「以「恢復西周禮制」解釋「克己復禮」之不諦」。為避免浪費篇幅，我決定不作詳答，請劉先生及讀者參看下期拙作〈原禮〉。但有一點須再簡單申說。《論語》全書一再顯示孔子一生最景仰的是周公，一生最大的使命是盡力企圖恢復西周禮制，這是兩千年來所有學人都公認的。如果劉先生硬着頭皮一口咬定孔子對「克己復禮，為仁」的真義「明顯是講個人的道德修養工夫，別無異解」，無人願與他長辯，因為他這看法大部分都是感情衝動、拒絕綜析全部史實的結果。此一名言如係孔子自創，劉說雖極度偏頗，尚有萬分之一的道理，因為孔子確是連劉先生本人都一再承認的，第一位將禮理論化、道德化、修養化的。但是，劉先生拒絕引用的《左傳》，明明記載：「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這句話是孔子自己佚的「古志」中徵引

的，這部佚書比孔子古，佚書句中所希望能「復」的「禮」當然是比這部佚書更古。就年代言，西周(1027-771 B.C.)之亡，下距春秋紀事開端僅四十九年，距孔子誕生僅二百二十年，難道那古佚書作者所希望能恢復的禮還不會早到西周時期嗎？如果西周就有哲人已把禮完全或大部分理論化、修養化了，孔子在國史上的地位還不需要向下重估嗎？還會如此崇高嗎？

可見即使置兩千年國學上一致同意的結論於不顧，對劉先生主觀推理上做出最大可能的讓步，他的說法也還是不能成立。

四 餘論

劉教授批評〈真詮〉一文中的相當部分與真刀真槍的學術無關，而涉及「人事」。例如他指責我：

由淵源上看，張君勳源出梁任公一系，陳寅恪寫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審查報告，作出了相當肯定的評價。這二位都是與當代新儒家有相當淵源的人物，為甚麼被推到了維明的對立面呢？難道何先生研究古史，竟然對於當代的學術情況如此蒙昧無知，抑或別有用心呢？

劉先生出世較我晚十七年，對30年代的學風自然不能有第一性的瞭解。當時清華、北大諸大師彼此互相尊重之中，仍不免對學問深淺、治學方法等等不時互相批評，根本不能以「淵源」解釋為辯論之由。例如胡適與馮友蘭在北大為師生，在哥倫比亞為前後同學，雙重「淵源」並不能免除兩人間一系列古代哲學史的認真爭辯。

金岳霖出身於清華學堂及哥倫比亞，原則上與胡適亦有雙重「淵源」，但在馮著審查報告中所評以胡為主要對象。陳寅恪家學淵源，曾去哈佛及柏林習梵文及中亞已亡古文字，持論至公，純自方法入手，根本不講人事淵源。馮、陳、金三位與胡之「爭」決不是清華、北大學派之爭，是純學術上之爭論。最可貴的是以上諸位先生私交不錯，馮、陳、金三先生對胡先生在整個文化啟蒙的領導地位一致公認，但這並不妨礙學問上真刀真槍的討論。這代宗師處世作人治學得中西之長，公私嚴分，一切對事不對人，這種風氣是非常令人憧憬的。

拙文〈真詮〉引陳師之說，因陳論全自純方法出發，不但可應用於檢討杜維明先生治學的方法，更可作為目前不勝枚舉的老、中、青專攻中國哲學史的學人的座右銘。凡是當代新儒家內外，有不先自訓誥探索章句原義，不深究古代具體歷史條件，專找古書中「歧出之義」，然後自「歧出之義」極力注入近代或西方觀念誇張美化古代哲人思想體系，完全忽略先秦思想兩千餘年間通過歷代種種制度阻力的實際歷史運作者，無一不犯陳氏所述方法上的謬誤。

非常令人不解的是劉教授如此重視《論語》，而對《論語》書中所表現的孔子處世作人的大道理有時卻茫然不解。《論語·先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眾所週知，季孫氏掌握魯國政權已久，財富比魯國國君都多。冉求是多才多藝、平日最為孔子欣賞的弟子之

如果西周就有哲人已把禮完全或大部分理論化、修養化了，孔子在國史上的地位還不需要向下重估嗎？還會如此崇高嗎？

一。可是他充任季孫氏主要家臣之後，為增加主人的收入而加重了人民的擔負。所以孔子斥責他「非吾徒也」，並且說如果青壯年人聚集起來打着鼓去進攻他都是應該的。一生深研《論語》而又以新儒家聞於當世如劉教授者，怎麼連孔子如何處理「淵源」和正義或真理衝突的大原則都不懂！還膽敢責備我不顧學術「淵源」？

劉文開頭即說「他(指我)勇於責人，維明對何先生來說無疑是後輩，何先生對之加以冷嘲熱諷，又含沙影射整個當代新儒家，完全看不出一點長者的風範，不免令人遺憾。」他說我「勇於責人」的確不無根據，可是他完全不瞭解責人的前提是事先默默地更嚴格責己之方法論斷是否真能成立。至於風範問題，我出身於英國及西歐史，博士後才全力轉攻國史，曾在多學科多次自資料運用、工具、觀點、思維、持論是否平衡種種方面「孤軍作戰」^①，或口辯或筆辯，絲毫不苟地據理力爭，不顧對方之地位與聲望。自風範而言本曾引起漢學內外不少學科學人的不滿和中傷。但對批杜一文而言，我一再提出他事先自設種種「限定」，通過相當微妙的英文寫作技巧顯示出對問題的多層瞭解。就該文內容主旨而言，我本可用較強的句調指出他用圓滑的英文明知故犯式地對孔子原義重心加以曲解這種不忠實的治學方法。可是我在文中多稱讚他的寫作技巧。杜氏對〈真詮〉初覆標題中「既驚訝又榮幸」的六字就是我嚴批方法之中尚有幾分厚道的有力明證，與劉氏批〈真詮〉採用先攻擊人身和「動機」為下馬威的「風範」似乎還有作人原則上的不同。

至於劉文責我「又含沙影射整個的當代新儒家」也是皮相之論。他如

何知道我雖是儒家傳統糟粕(被歷代帝王利用的結果)的批評者，實際上又是發揚孔子思想體系中一項改善挽救封建體制最公允、最具普遍超時空性，甚至對改良今後人類社會不平長期最有效的理論主張——「有教無類」——用功最勤、用盡可能最多統計、最多種資料的詮釋者和證明者^②！

他如何知道我1966年7月高票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之後，只有我能想到而且能做到藉提名新儒家宗師錢賓四先生以化解他與傅孟真先生主持下之史語所數十年的爭執與「誤會」？他如何知道我克服王世杰院長對錢先生「天真式」中西古史文化比較當面質難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研院不宜，也不該，給天下後世留下派系觀念過強，缺乏容人胸襟的口實？他如何知道，自徐復觀先生贈文贈書之後，他我之間即有對古史不少問題上的共同看法，因而默默之中產生了極少人知的互慕之情？他如何能真正瞭解我批杜一文的大目標是那位與杜類似、置歷史真實於不顧的新儒家，而不是所有的新儒家？

我本想指出劉氏批〈真詮〉文中呈現出若干學術專識缺乏深度之處，篇幅已如此之長，姑舉「君子」一例。劉先生說「譬如他(孔子)講君子，是以德為內涵，不再以血統地位為標準」。事實上蕭公權教授半世紀前即已統計了《論語》中的「君子」，深刻地指出有的是指在高位者，有的是指有德者，有的二者兼具或無法判斷是有位或有德^③。《左傳》、《國語》和周代經典中所謂的「君子」，極大多數仍是指由血緣決定統治階級成員身分的「君子」。

註釋

① 60年代我被迫所做對明清社會階層間流動問題答辯之作不必詳列。《農業考古》某卷某期言及我70年代上半闡發中國農業本土起源論時，想像我在海外「孤軍作戰」情況，對當時國內竟少人知、竟無人遙遙助我應戰，表示憾意。我讀後深為感動。

② 拙著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62及1969增校本，及1974意大利文譯本，及即將問世的日譯本，並紙面多次重印本)。此書除廣泛涉獵大量多種有關明清制度及社會史料之外，分析了近四萬明清兩代進士及十九世紀舉人、貢生的三代履歷。全書證明「有教無類」的逐步

部分的實踐確在中國近千年社會上發生積極作用。在家舍內外情況許可下，將撰中文摘要以就正於海內外廣大的讀者，文中並將略闡何以「有教無類」才是孔子遺教的精華，並至今仍具有世界性的現實意義。

③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冊1(上海商務印書館，1945)，特別是頁49–52和頁61–62的註(75)。

何炳棣 初治西方史，後轉攻國史，為當代著名的中國社會經濟史及史前史家，著述豐富，影響深遠。何教授目前定居加州Irvine。

